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Zhangguangshi
menshuopinji



张 光 直 学 术 作 品 集

考古学

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

张光直 著

曹兵武 译

陈星灿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张光直著；曹兵武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2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ISBN 7-5382-6207-5

I. 考… II. ①张… ②曹… III. 考古学-研究-中国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80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105 千字 印张：5 插页：4

印数：1—5 000 册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江

定价：10.00 元



◎与李济在台湾大学 [1952]



◎郑光、徐苹芳、张光直、许景元在偃师



©在殷商文化讨论会上 安阳 [1988]



◎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的办公室研究甲骨 [1980]



◎在考古所偃师商城工作站观察陶器



◎青年时期的张光直



◎与高有德（左一）、臧振华（右一）等在台灣考古遺址 [1988]

弗雷德序

在中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好多个词汇来表示“再思”(rethinking)这个意思。

本书作者张光直先生曾经是国立台湾大学的考古与人类学系最早的毕业生,师从于著名学者李济先生,然后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任教。由这样一位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学者来重新检讨考古学研究和分析方法的一些基本方面,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张光直先生研究的兴趣和时空范围非常广泛,但是,相对而言,他更为关注他的祖国。他最近的一次发掘是在中国台湾进行的,这次发掘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的例证部分,并且是一个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传统观点的一个重新思考。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光直先生会对考古学理论的新发展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作为一个终生都在文化的冲突中生存的学者,他比其大多数的美国同行对重新检讨考古学基本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程式的意义更为敏感,因此,他一直在试

图证明这些东西,这也正是他的特色。

我很高兴能将张光直先生的这本书收进这套丛书(Studies in Anthropology)。事实上,张光直先生是第一个认同于本套丛书的宗旨的学者:不试图建议什么,而是力求在当代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中,进行一种新的综合和突出重点的尝试。这和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不谋而合,而正是这种观点促使丛书的作者们超越现状,探求未来。

莫尔顿·弗雷德

Morton H. Fried

1966年6月于台北

前 言

在我看来,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代文化及文化史的学科。它既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存的揭示也包括对认识结果的交流。因为在考古学中我们面对的是文化和社会中的人,所以,指导和左右考古学的方法和技巧的理论与历史学及人类学就有一些不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文字的记载,也不是可观察的人类行为,因此,考古学的理论必须适应于考古学家用手铲挖出的古代的物质遗存。考古学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和方法,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或许只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理论的考古学翻版。

一个理论体系必须既严密又充满着生命力。严密意味着符合逻辑并具有可行性;生命力意味着它是进化的,能够容纳新的东西并和其他的人类知识同步增长。由于考虑到考古学的进步离不开考古学家的思考,我没有冒昧地把本书叫做“考古学的进步”。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及社会的进步不同,每一次“再思”都会带来一个理论思维或认识上的“稳定态”,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由一个“稳定态”到另一个“稳定态”,如果本书的标题“再思考

古学”和那个被我们摒弃的——“考古学的进步”表明我不是原创性的,那仅仅是因为我想使考古学与它在人类学中的其他姊妹学科保持同步。

本书源自我 1966 年春季在耶鲁的一个题为“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的人类学讲座。讲座的内容并不是考古学的导论,而是当时当地一个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理论的思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解释的那样,本书的有些自负的标题并不意味着书中的一切都是再思的结果,我所表达是我所认为的什么是考古学理论最基本的东西,书中许多都是我的同事们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但是,尽管许多东西已经被他人说过,我省略了不必要的引经据典和对号入座工作,但本书的主要观点仍然要由作者自己来负责。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学术生涯里,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自 1960 年我就开始开设这个讲座,而每讲一次,内容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本书更确切的题目应当是“一个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的再思:1966 年”,如果上帝和出版社允许的话,为保持思考的连续性,也许同一题目的 1969 年、1975 年甚至 1984 年本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您的眼前。

我对考古学理论的兴趣主要应归功于我的美国同行,但是我自己主要应是一个东亚考古学专家,因此在本书中我主要用东亚考古学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如果读者认为这些例子太陌生的话,另一方面它们也证明了我们这门学科的某种普遍性。

尽管所有对我的再思提供了帮助的人都已经出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当中,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莫维斯(Hallam L. Movius)、威利(Jr. Gordon R. Willey)、罗斯(Irving Rouse)的名字,1965 年秋

季,我有幸听了罗斯的名为“史前史的解释模式”的讲座,曾经受到极大的启迪。但是罗斯并不必对本书的观点负任何责任,相反,我们常常因为观点不同而彼此争论。罗斯、科(Michael D. Coe)、考科林(Harold C. Conklin)曾经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作了些有益的评论。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参加了我的讲座并发表了热情的、发人深思的评论以及建设性的批评的学生们。怀德小姐(Mrs. Anne F. Wilde)对初稿的文字作了编辑和加工,莱庭顿小姐(Miss Ward Whittington)为本书绘制了插图。

我能够写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小克林德·克拉克洪,他鼓励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并对我许多幼稚的提问虚怀若谷。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怀念这个难得的学术上的评论者。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他。

我很感谢弗雷德先生(Morton H. Fried)把本书收进“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他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稿并帮助减少了许多错误。

张光直

1966年5月1日于纽黑文

目 录

弗雷德序

前言

第一章 再思考考古学	1
第二章 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再思考	14
第三章 聚落	32
第四章 微观环境	49
第五章 类型学与比较方法	59
第六章 考古结构与方法(之一)	75
第七章 考古结构与方法(之二)	93
第八章 集大成的考古学	107
第九章 考古学与现实世界	122
 译后记:考古学的灵魂	 134
参考书目	139

第一章 再思考古学

本章的标题来自于人类学的启发。

利奇在《再思人类学》(Leach 1961:1)中说:“为了很好地理解当今社会人类学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我相信我们有必要从初始出发,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概念——像婚姻、世系、兄弟姐妹这些基本的语汇到底意味着什么——基本概念就是基本概念,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根深蒂固且难以改变”,因此,再思实属必要。在考古学中,事情同样如此。

我对当代考古学语汇中的“新考古学”一词颇不感冒。任何现在所谓“老”的东西都曾经新过,而任何现在“新”的东西都注定要变老。称自己的考古学是新的,仅仅把自己同“老”的区别开来,丝毫无助于吸收和利用“老”的考古学。而“再思”却是一种推陈出新的、不断的、必要的学术性的精神操练。

美国当代考古学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恐怕沃尔夫(Eric Wolf 1964:68—69)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了:

新考古学将自己从搜集古代碎片和梦想复原被尘土与丛林深深掩埋的古代废墟的荣光中解脱出来,转向对古人

的整个聚落的揭示;从机械地收集古代的物质文化的碎屑,转向对整个古代人们共同体的重建,从而试图在考古学中抓住生态学中的群落和人类学中社会组织的对应体。

历史常给现在以启迪。为了明确考古学家在沃尔夫所说的转向中是否成功,以明确考古学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什么是考古学中的基本问题以及考古学家如何处理它们。我的目的不是要对考古学史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我也不打算涉及各种不同的观点,由于我的兴趣主要在于一般性的理论,我将只讨论那些和考古学一般理论发展相关的观点。也许我的看法不无偏颇,但是像斯泼尔丁(Albert C. Spaulding 1953b: 590)一样,我不同意“真理可以由在考古学家中进行民意测验来得到,考古学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考古学家感到高兴。”

如果我只能谈一个问题,我将选择考古类型学这个概念及其运作。我认为 20 世纪考古学方法论发展的焦点是围绕着分类这个问题展开的,曾经有过两次明显的变化,一次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考古学家由仅仅关注单一器物的类型到把它视为人类行为的遗存之一,换句话说,由简单分类、为分类而分类到复合分类;另一次变化尚未完结,这一次考古学家开始把一群考古遗存视作文化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即由历史分类到系统分类。第二次变化主要发生在美国,但是它代表了当代考古学的主流,标志着考古遗存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考古学家理解制造、使用、废弃它们的人的一种手段,更进一步说,这一变化代表了一种试图抓住可以更好地解释考古遗存的基本单位的理论趋势。

我们中的许多人非常陶醉于考古学中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其实,要确切地理解这些变化或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必须很好地了解类型学中的第一次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来说,要理解 30 年代和 40 年代罗斯、吉格尔和克拉克洪等所讨论的考古类型学的革命性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正是他们当年的工作塑造了今天的考古学的面貌。

讨论任何事情都没有必要一定要穷根究底,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和当时的一般知识状况挂钩,在人类学的框架里就足以理解考古学中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前面所说的考古学的变化大约要追溯到 30 年代,因为这个时候,美国的人类学家才开始逐渐走出博厄斯学派的影响。实际上,由于面对的是印第安人的遗存,由于不断地亲眼看着这些遗存是怎样由人类学资料转变为考古遗存,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和民族学家彻底地区分开来。当威利和菲利浦斯说:“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Gordon Willey and Philip Phillips, 1958:2)时,他们实际上说出的是美国数代考古学家的心声。尽管美国考古学从来就不缺乏关注古代遗存的行为特征的传统,但是,将它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的思想则是来自旧大陆的,而且它后来的发展也没有彻底地脱离旧大陆的古物学的白巢。“整个 19 世纪的考古学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古物仅仅看做是古物——古代留下的物质的遗存,无论是世纪之初人们把这种遗存作为艺术的对象,还是世纪之末将之视为日常生活的一般性遗存。”(Daniel 1950:302)到本世纪初,才有人尝试着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出土背景,比如它们相互间的地理与生态关系,或记录一类古物的分布模式或同一时期的古物的分布模式”(Daniel 302—303)。这些充其量也只能是古物学的进一步延伸或观察

古物的参照系的放大,考古学的核心概念除了古物还是古物。

第一个对这些基本问题提出质疑的是克拉克洪。他在一篇至今仍很有影响的文章《中美洲研究的概念结构》(Kluckhohn, 1940)中,提请考古学家思考这些问题: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对我以下的分析至关重要的两个前提性的概念。第一是,在丰富我们有关人类的经验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工作更“学术”些,至少在运作上更“学术”些;第二是,在任何一种学术运作中,都存在推理或概念的和事实的这两种因素。以玛雅考古学家为例,他们不能只对考古遗存本身感兴趣,考古遗存自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它们只是在某一前提下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望。搜集、分析和综合所有的比如说与太阳历法有关的考古资料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它或多或少都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行为或历史……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来搜集和安排这些资料,它们对丰富人类的知识将是无用的。(42页)

研究人员难道可以不需要获得社会的支持而仅仅只限于关心一小部分人的求知的兴趣吗?如果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不顾及这些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事实表明基金会和其他的科研支持者已开始注意这些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怀疑如果考古学家不把他们的工作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努力的组成部分,他们将会成为赫胥黎笔下那个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叉子的三个齿的发展历史的古怪的人物了。

自30多年前克拉克洪写下上述这段话以来,中美洲研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某些情况下,克拉克洪的话至